

根深而葉茂，任重而道遠

朱少璋博士談語文教學中的「文言」

■ 文：史超活



朱少璋博士

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高級講師。曾應邀出任舞台劇文學導引、電台文教節目主持；歷任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評判及選材委員、香港浸會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名譽學者。近年與教育局合作，多次主持專題工作坊及公開講座。

朱少璋博士謂自己是一個傳統的人，他喜歡喝茶、喜歡粵劇、喜歡古典詩，平常上課，他總會在言語、筆記裏穿插古典詩文，每次遇上經典詩文，他就着學生背下來：「這麼好的作品怎可以不記住呢？」談到文言教學，你以為他會主張以文言經典為主要的教學材料，但他卻談如何將「文言」滲入平常的語文教學中，兩者的分別是，文言經典不只是放在中文課本裏供人觀賞的文字，學習文言不必囫圇吞棗地死記硬背，文言經典能夠與生活掛鉤，阜豐我們日常溝通的內容——這是一個不單重視「輸入」，還重視「輸出」的「活化過程」。換句話說，文言是語文教學中的一個部件，或者更正確地說，是滲透其中的元素。讀到這裏，老師大概會心生疑竇，難道要學生用文言寫作？有這個必要嗎？朱博士就告訴我們文言如何激活創意，融入生活。

語文來自變化，不是發展

許多學生，甚至老師都覺得白話是從文言發展而來，所以文言是「已死掉」的語言，對現實生活毫無用處。朱博士卻認為，文言不是「發展」而來的，是「變化」而來的。前者強調舊事物的滅亡和新事物的產生的本質，即由新事物代替舊事物，如事物由小到大，由簡到繁，由低級到高級的進程；後者則突顯新舊體俱備的「化合」過程。朱博士引《禮記·中庸》一句闡釋：「初漸謂之變，變時新舊兩體俱有；變盡舊體而有新體，謂之化。」也就是說，文言摻進我們平常用的白話之中，所以文言非但不是已死，反而在現代生活中發揮着傳意，甚至是點睛的作用。朱博士隨口便舉出一例：我們平常形容人「恃才傲物」，其實一個人對着物件顯得高傲，有甚麼問題呢？他又沒有傷害別人。因此，把「物」解作「物件」是說不通的。如果知道此「物」在文言中解作「羣眾」，那「恃才傲物」的解釋就合理得多了。

循這例子推想下去，說不定嚴復的經典翻譯名句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」中的「物」也不單指「物種」，還可指「人羣」了，如此一來，這句說話便不單點出達爾文「進化論」的基本理念，還成為了待人接「物」的訓勉了。「物」在文言中還解作「社會」或「外在環境」，范仲淹〈岳陽樓記〉

中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」的「物」便作此解。〈岳〉為教育局最新頒佈的文憑試十二篇範文之一，如果老師在施教時加入以上成語、諺語，當能幫助學生牢記「物」的多重字義。再看蘇軾〈前赤壁賦〉：「**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。**」 「物」在一般白話裏的含義是「客體存在之物」，〈前〉裏的「物」，似乎還多了點中國傳統「天人合一」觀念中「天」的況味。老師只消跟學生分享這份自身修養的文化品味，即使簡單如一個字義的比較，也足以成為令學生如沐春風的一課文化講堂。

不知道「文化」一詞中的「化」，跟上引《中庸》所言「變盡舊體而有新體」的「化」，是否也有異曲同工之妙？

文言作品多取之於經典

語文既是變化而來，那麼，整個「化合」過程，就是一個去蕪存菁的過程。其實語言，就像亞馬遜熱帶雨林中的生物一樣，每天都有新物種誕生，當中有許多出現不久便迅即滅絕。這就像日常生活中，每天都有許多「潮語」誕生，例如「屈機」、「頹」等等，這些近年冒起的「次語言」，先不要說能否進入「白話書面語」的殿堂，它們可能很快便給淘汰掉。電影《字裏人間》講述一羣編輯為了編纂最周全的字典《大渡海》，不辭勞苦地深入坊間，拿着字卡記錄自己所聽見的新詞匯，這似乎不符事實，因為有些詞語在字典出版時已經自然地滅絕了。

同樣，文言中有不少字詞，現在都已不用了，現時常用的字詞約有四千多個，但在《辭海》、《辭源》中所收的幾萬個條目中，泰半已是今天甚少採用的，那就是說，今天留下來的文言字詞，或跟常用的白話化合了的字詞，多半都是中文的精華，就像上面所說的「物」字。

按此思路來看文學作品，我們大概會明白何解朱博士強調：「經典不一定是文言作品，但大部分文言作品都是經典。」因為文言經歷了時代的淘洗，現在留下來的，應該就是能夠引起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共鳴的作品，這些作品所點出的，該是中華民族的「普遍關懷」了。

閱讀文言經典，對於朱博士來說，除了能承先人遺風以外，更重要的就是對寫作大有裨益。從來文句是否凝煉，是衡量一個人語感高低的其中一個標準。朱博士強調，由於文言精練，所以是鍛煉語感的上佳材料。倘若老師可以令學生以寫作凝煉文句為鍛煉的目標，那麼學生在寫作時能減少沙石之餘，還可以學習運用最少的文字，表達最豐富的含蘊，這就是寫作最基本的韻味了。

朱博士素來喜歡創作，除了散文出色（其散文集《灰闌記》及《隱指》分別獲得中文文學雙年獎首獎和推薦獎），還擅寫古詩，出版過幾本古典詩集。「第一本出版的詩集是在大學讀書時自資出版的《平仄詩草》，有着學生時期的痕迹。第二本是《琴影樓詩》，頭四首從第一本詩集收錄下來，記錄學生時代的風格，其餘的則較成熟，且具創作意識。還有一本是以古典詩作為工具的書——《燈前說劍》，當中用了八十首詩來詠懷任劍輝的劇藝，可見古典詩也有實用價值，這一本很受歡迎，先後出了兩版。」

無論是創作白話散文，還是古典詩詞，朱博士坦言不少靈感都是來自文言經典。「佔中」事件期間，筆者某天冒昧再造訪朱博士，但見辦公室門上貼了他的新作〈詠傘十三絕句〉，其中一首是：「**舉傘田田似葉擎，風荷露轉雨頻傾。碧圓自潔秋心老，非托蓮根在此城。**」詩中以蓮喻傘，是一巧喻，「田田」二字，令人想起〈江南〉：「江南可採蓮，蓮葉何田田！魚戲蓮葉間……」帶出一片蓮葉盛開的豐收畫面；「葉擎」、「碧圓」則讓人想起





周邦彥〈蘇幕遮〉的「葉上初陽乾宿雨，水面清圓，一一風荷舉」，為畫面加入雨景，暗伏隱憂。周用「舉」，朱用「擎」，將蓮葉暗喻為「高舉的拳頭」，給畫面注入了力量，有異曲同工之妙；另外周云「清圓」，朱云「碧圓」都令人聯想到磊落的初心，而「自潔」一語進一步實證了以「碧圓」喻「高志」的想法。詩境至此已從表面的輕鬆轉為明志的高亢。最後一句，更讓人想起李白的〈古風之二十六〉：「碧荷生幽泉，朝日豔且鮮。秋花冒綠水，密葉羅青煙。秀色空絕世，馨香為誰傳。坐看飛霜滿，凋此紅芳年。結根未得所，願托華池邊。」李白慨歎，眼前清麗的花容和清香的氣息，算得上是絕色，但誰懂得珍賞？於是冀盼「蓮根」可以在王母的瑤池裏栽種，永不褪色。同樣朱博士冀盼學生高舉的民主的初心，不會受到糟蹋，得以永遠保存。整首詩可說是起、承、轉、合俱備，詩意層層遞進，激昂中不失委婉。

散文創作方面，朱博士坦言自己追摹周作人一脈，朱說周作人的散文寫得好，跟他古典詩寫得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：「近代寫古典詩的有周作人和蘇曼殊這兩家，我很迷戀周作人，他的打油詩寫得很精彩，我寫作時，總不經意受他的詩影響。雖然他的詩不能與杜甫的相比，但寫法很有新意和生命力，讓人知道古典詩為何仍保留下來。他的詩詞表面通俗，意韻卻非常深遠，現在仍在寫古典詩的人應該要偷師。」朱老師對周作人評價甚高，筆者抬頭看其書櫃，但見一排周作人的作品羅列在當眼處，熱愛之情不言而喻。

言談間朱博士提及另一位大作家董橋：「周作人的寫法傾向陰柔，作品較閑散、疏放；而董橋則擺起架勢去寫，有整個框架的部署，其文章是嚴肅的『大散文』——我們如能向兩者都學一點就好，從周作人的散文學習儒雅、閑逸和韻意，至於

精緻、認真，以及語言的養分，就向董橋學習。」在吸取寫作精華方面，不難發現朱博士很重視兼容並蓄。

文言學習是需要更是應要

文言既是中國經典的寶庫，它自然有着豐富的文化根柢；只有根縱深遠，才能像周作人那樣做到「古今並蓄」。朱博士說：「身為中國人，我們有責任學習文言，除了修養自己，也是宏揚自己民族的文化。」同時，他再三強調，文言不是死翹翹的語言，學生學習文言，不應抱着傳承一門快將失傳的技藝的心態，而是應該明白要學好語文，便必須學好文言，因為它和日常生活的讀、寫、聽、說，甚至思維都有密切的關係。我們在生活中，隨處都可以吸取文言的養份，只要我們肯投入學習的氛圍之中，文言其實一點不難。

朱博士在其著作《規矩與方圓：從經典作品學習寫作》中指出：「以趣味主導閱讀是可行的，但趣味並不是閱讀的惟一導向。閱讀某本書有時也是為了肩負某種『責任』的。」以「責任」指導閱讀的方向，似乎並不輕鬆；以此作為學習古文的指向，擔子更顯沉重。朱博士解釋了「趣味」和「責任」其實並不對立：「兩者是可以並存的。學習古文時，我能感受到很大的樂趣，但同時是為了一份責任。當然，學習任何事情都應以興趣為先，沒有興趣，怎樣維持下去呢？有時不是作品本身沒有趣味，而是選材

恰當與否的問題，例如你給小一學生閱讀一首寫給女朋友的詩，他又怎會有共鳴呢？沒有共鳴又怎會有興趣呢？如果選材切合讀者的話，我不相信讀者會完全不感興趣。之所以提到『責任』，是退一百步而言的，若有人真的絲毫提不起興趣，才跟他說責任的問題。這裏說的『責任』，是指中國人學中文的



責任，外國人學中文可以只學文法，但中國人不一樣，中國人要學文化、學古文獻，還有情義、道德品格等等；所謂的責任，是從中國人學習中文的角度而言，並非要給予年輕人壓力。」

未來中學文憑試將重設文言範文，有指這是「走回頭路」，朱博士有另一番見解。「我認為現在的人對設範文有誤解，其實範文一向存在，只是之前閱讀範圍較大，感覺形同虛設。過大的範圍致使每間學校的老師選教的課文都不一樣，這是很大的問題，因為學生上到大學後便缺乏共通的地方，沒有既定的溝通平台。以往大家都認識〈六國論〉、〈出師表〉等，但現在我提出來，卻沒有人知道，這不但造成學生溝通的阻塞，也令大學老師教學時困難重重。我建議重設範文時，精選一些必教的文章，例如蘇東坡、韓愈、柳宗元等古文八大家的文章，學生在中學時讀過這些文章，大學老師上課時才有例可舉。內地學生學中文也要讀很多範文，我不認為這只有尖子才能做到。」

綜觀現在的文學教育，朱博士坦言存有不少限制。「現時小學課堂時間有限，老師無法傳授足夠的古文知識給學生，結果學生在小學畢業時，文言知識貧乏，中學時遇到古文經典，便感到一頭霧水，加上讓中學自由決定是否開辦文學班，這樣，古典文學的傳承便會慢慢消失。」他直言，中文老師站在教育前線，應該盡力而為。「在現時的限制下，前線老師可否多做一些，力挽狂瀾呢？他們其實可在課堂裏多教一些文化知識、古文詩詞。另外，我建議中、小學也滲入這些文化、文學元素，讓古文知識保存下來。」朱博士說得着緊，身為大學老師，他稱自己是「把尾關」的一員：「老師的責任是把應該傳授的知識教給學生，小、中、大學的老師在不同崗位有不同責任，我就負責『把尾關』，因為學生讀完這三、四年後，很可能不再讀書，若是中、

小學老師不能讓學生得到相關知識，我便要替學生『補底』，讓他們知道，學習古文是他們的責任。」

朱博士在浸會大學沒有教授古典文學的科目，但他並未有放棄把古文知識傳授給學生，反而極力在自己的課堂裏穿插相關知識。「礙於課時和課程的圍限，我可以使用的教學方式是浸透，即不時在課堂中舉一些與古文相關的例子，或說故事，以吸引學生的興趣，讓他們自發地探究更多。我認為這是播種的行為，如果每位老師都肯下這些功夫，就能發揮作用。」學生的反應是怎樣的呢？「有些學生聽到有趣的故事，會於課堂上發問，我通常在課後再跟他們細談，並嘗試拉攏他們加入詩社。如果他們日後當上老師，便能夠實踐所學，包括我個人身教的示範，然後把古文、文學知識傳承給下一代。」教授「中文文詞鍛煉」一科（課程主要教授語文運用的技巧，從而提煉文句、潤飾文字），朱博士在每章的筆記末部，都會引用《文心雕龍》作結，他說：「這樣做是想讓學生知道，所有文詞鍛煉的技巧、文學理論的基礎都是由中國文化而來，我們的古典巨著早有提及，並不用向外國文學取法。」他致力保衛中國古典文學的地位，使它在文學洪流，甚至教育制度的桎梏中不被遺忘，實在令人感動又佩服。

訪問尾聲，朱老師向筆者分享他的一個小祕密，就是他每次上課和演講前，原來會預備一份詳盡的文稿，裏面不但有演說內容，甚至連「笑位」也預先構思好。稿寫好後，朱博士還會練習好幾遍，務求為自己的課堂或演說作充足的準備。這種凡事認真的態度，相信並不只因為他對中文的志趣濃厚，更是出於他對傳承中國文化有一份拋不開的使命感。

如果「根深而葉茂」是學習文言的心法，那麼我想朱老師大概會同意「任重而道遠」是教授文言的必要取態。

